

民国成都城隍庙经济的变迁研究

张彦 史英壮^{*1}

【摘要】：城隍庙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空间，城隍庙会催生了城隍庙经济，城隍庙经济又促进了城隍庙的扩大和繁荣。城隍庙和城市经济互生互荣、彼此影响的关系在清以后日益明显。及至民国初期，城隍庙市经济已经蔚为繁盛，城隍庙中的小贩和江湖术士从事的个体经营活动也在城市经济中扮演了“细胞”角色，城隍庙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成分。但随着城隍庙的衰落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加剧，城隍庙市和城隍个体经济开始转型，并逐渐为近代新经济形态所取代。

【关键词】：民国成都城隍庙城市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7）11-0111-6

城隍信仰是中国民间的一种信仰，由城隍信仰而产生的城隍庙是城市重要的宗教、文化和经济活动空间。城隍庙的兴起和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由城隍庙派生出来的城隍庙经济，是古代传统经济的衍生，是古代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城隍庙经济也经历了被冲击、被改造、被取代的过程。其转变过程，也是城市经济转型的缩影。本文拟以成都城隍庙经济为考察对象，对城隍庙经济在近代的发展状况做一初步探讨。

一、成都城隍庙经济的历史变迁

明代中叶后，城隍庙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城隍庙数量增多。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明清江南城隍考》中就注意到明中叶后江南新兴市镇涌现出大量城隍庙的现象，并认为这是市镇经济发展后，市镇居民政治文化需求提升的产物。⁽¹⁾其实不只是市镇城隍庙的出现，清代之后省级城市中的城隍庙数量也明显多于明代。以成都城隍庙为例，明代成都城隍庙只有城北郊外一座^①，而到了清末已经出现了至少三座（一说五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隍庙。⁽²⁾二是城隍庙中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多，城隍庙逐渐成为城市中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其中最能体现城隍庙经济特性的就是城隍庙会。如《五杂俎》有云：“京师朔望及二十五，俱于城隍庙为市。它时散处各方，而至此日皆合为一市者亦甚便之。”⁽³⁾

成都城隍庙最早见于记载是唐代中期，其大致位置在府城西，但其具体状况已不可考⁽⁴⁾。宋元时期成都的城隍庙不见于典籍。明代成都城隍庙有两座，一座在蜀王府西南，另一座在城外北郊。但明天启《成都府志》中仅述及城隍庙的具体方位，其修建时间和城隍庙内的经济、宗教活动无从得知⁽⁵⁾。明末清初，成都的寺庙宫观等多毁于农民起义军的战火之中。

清代成都的城隍庙有三座^②，分别是下东大街府城隍庙，修建于康熙年间；华阳县城隍庙修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屡有培修；成都县城隍庙修建于明代，后增修于清咸丰年间。这三座城隍庙在清代都形成了小型的商业市场。⁽⁶⁾民国时期成都的城隍庙基本承继了清代城隍庙的数量和规模。

成都城隍庙和城市经济的关系是共生共荣的。一方面，城隍庙的兴衰受到城市经济的影响。明末，成都城市毁于战火，城隍庙作为城市中宗教、经济空间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康熙年间以后，湖广填四川，成都的人口增多，耕地得到开垦，城市经济相应地得以复兴。⁽⁷⁾成都的城隍庙得以重建。清代中后期（乾隆、咸丰和同治年间）成都城市没有遭受农民战争的破坏，城

¹ 作者简介：张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史英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00。

市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因此城隍庙也屡次修缮。另一方面，城隍庙在城市传统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城隍庙为城市的经济文化活动提供了场所，为活动在庙中的商贩提供了生计，反过来这些经济文化活动又促进城隍庙的发展。

城隍庙所衍生出来的经济性，也体现出以工商业为经济主体的成都城市经济的格局，即城隍庙所在的区域，亦是成都城市经济繁荣和工商业发达的区域。这种格局延续至今。如历史上城隍庙所在的城隍庙街、东大街、华阳，在今天，仍然是商业繁华的地区，是城市经济中心。

二、成都城隍庙经济的重要载体——城隍庙市

城隍庙的庙会^⑧最能体现城隍庙在传统城市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民国成都城隍庙的庙会先是三年举行一次，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变为一年三次，分别是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半）和牛王节（十月初一）^⑧。成都的城隍庙会一般由当地的袍哥堂口主事，费用则由各行会中的商人集资操办。届时，府城隍庙和北门城隍庙都会举行庙会活动，但是尤以北门城隍庙的庙会最为热闹。到了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庙门外一带田坝搭棚，商货虚集，及木器、竹器、铁器、农器，陈列摆满售卖。生意发达，中道两旁，悉为花草市，男女游人，拥挤不通。庙中香火大旺，烧香妇女，如潮水狂蜂一般地争先跪拜城隍云。”这种若颠若狂的城隍庙会则持续三天，长则半月有余。参加庙会的不仅有成都当地的民众，“还有许多来自各州府县的官吏、商贾、士绅、僧尼等”。这说明城隍庙会是官民共同参与的经济文化活动，而城隍庙无疑是官民共有的公共空间。据称，城隍庙会期间，“参与人数不下十万人”^⑨，其热闹程度可见一斑。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分析，城隍庙会无疑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荣。庙会中除了售卖农器、铁器、花草之外，地方精英还会举办祭祀活动，并邀请戏班在城隍庙中演戏酬神。

其实除了繁荣当地的经济外，这种夹杂着祭祀和各种娱乐活动的城隍庙会活动还有两种重要的社会作用。第一，由于城隍神在本质上属于一座城市的保护神，具有明显的地区性。所以无论是组织庙会活动的地方政治、商业精英还是参与庙会活动的普通大众，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本城市或本社区的一员，都受到城隍爷的保佑。通过这些经济活动，对个人而言能获得心灵的慰藉，而对整个城市社会而言，则能起到增强地域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作用。第二，官民共通参与城隍庙会这一经济文化活动，可以暂时打破平日等级森严的社会规范，使得官民都以“逛庙会者”的身份参与进来，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让日常被压抑的心态在庙会的集体狂欢中得以释放。^⑩

每年正月初九至正月十六，成都东大街都要举行灯市，而灯市又以府城隍庙为中心。从初九夜起，东大街附近就要架起各种各样的灯饰，“细木作架，髹以金漆；上段罩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步，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每逢灯市，还会有舞龙狮、放焰火、踩莲船、踩高跷、百技杂耍等活动。届时，前来东大街和府城隍庙观灯、看杂耍的游人络绎不绝。人群中还夹杂着华丽，擦脂抹粉的妇女和穿金戴银的商人，他们引来了瘴神、小偷的“光顾”。因此无论城隍庙会还是正月的灯会上盗窃和骚扰妇女的案件频发。官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警察到城隍庙和东大街上巡逻，以维持治安。^⑪民国时期的城隍庙会和古代庙会不同的是政府开始更多的对其进行干预和管制。这种政府干预活动使得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受到了压制，逛庙会者不得不按照政府的指令来注意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即使城隍庙灯市会受到了政府的管制，而且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但逛灯市的游人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当时的一首成都竹枝词描绘了城隍庙灯市的喧闹情景：“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⑫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柴和米一直都是民众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民国时期的成都在四门都有交易的米市，府城隍庙的米市就属于“东市”。城隍庙的米市分“大市”和“小市”两种。所谓“大市”就是每年新米上市之时，成都平原附近的各州县的米商、乡户集中于于此趁机售卖。买米的顾客大都是成都的米商和中等以上的富裕人家，这些人都是米市的大头客户。此外成都常年靠米店为生的人也要多买一些。“每月逢三、六、九，城隍庙还有为期半天的米市，称为“小市”。附近中和场、龙泉驿和西河场等地的居民都会赶到庙中卖米。上午十点是米市最热闹的时候。届时，人头攒动，米贩子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一直到下午两点后又才恢复平静。”^⑬

城隍庙中的米市的存在说明它是成都城市中一处重要的经济空间。一方面，城隍庙米市的出现与繁荣折射出民国成都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粮食的商品化流通为成都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米市的存在是粮食流通的重要基站。通过粮食的流通，可调节各区域之间的粮食供给，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互补格局的形成，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13]。另一方面，城隍庙米市又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许多经济、文化和社会信息由此散布到成都的大街小巷。而至于为何把米市设在城隍庙中，除了东门城隍庙靠近东大街和东门，交通便利等因素之外，可能和城隍爷秉公执法的形象有一定的文化联系，因为买卖的双方都重视交易的公平。

三、成都城隍庙经济的重要部分——城隍庙的个体经营

城隍庙中除了庙市等大型的集体经济活动外，还有不少分散的个体商业行为。民国成都城隍庙是小商贩、江湖先生摆摊设点的重要场所。

府城隍庙的坝子上，设有许多小吃摊子，有“肥肠豌豆汤”“牙牙饭”“甜水面”和“馄饨锅盔”等，这些小吃物美价廉，深受当地普通市民的喜爱。如当时的《锦城旧事竹枝词》赞到：“豌豆如泥肥肠钯，钟敲府庙客喧哗。烧香出殿门前坐，汤鲜饱味到家。”^[14]又如“牙牙饭”就是一种用米饭煮成的饭块，一般可以按照客人的需要切成几块。这种“牙牙饭”分量很大，一“牙”总在半斤大米以上，干体力活的人吃上一块，再加上一碟小菜就可以吃饱。从城隍庙中所卖的小吃中，我们可以管窥民国时期成都下层民众的饮食结构和收入状况，城隍庙中的不少小吃一直保留到现在，体现出成都民众饮食风俗的延续。

城隍庙中还活跃着一批这样的人，他们平日以算命、看相和卖药为生，成都人把这些人统称为“江湖先生”或“江湖骗子”。在精英的眼中，这些“江湖先生”的名声并不好。^⑥当时成都的迷信之人不在少数，“惑于风水者百分之九十九”^[15]。算命和看相先生就利用老百姓大都愚昧迷信的心理，通过预测人的吉凶祸福为生。在府城隍庙戏台附近的院坝上，挂满了看相、算命、摸骨和拆字先生的各种幌子，如“赛君平”“刘半仙”“神童子”“满天飞”等。这种算命的摊子在城隍庙一共有二十多家。算命先生一般都是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江湖”，若是有人来求签问卜，他会通过来者的年龄、相貌、穿着、举止和谈吐来判断其身份，揣摩其心理。如果算命的是一位学生来问“考试、升学是否顺利？”算命先生都会说“顺利！公子乃文曲星转世。”等阿谀奉承的话来讨对方的欢心。“人们最爱奉承，通过“哄”的手段，使算命的人得到安慰和满足，而算命先生的饭钱自然也到手了，于是皆大欢喜。”^[16]算命先生还有一招，就是“吓”，说来算命的人近日犯“白虎星”“扫帚星”“命里犯小人”。算命的人若是相信这些谶语，就会急着问消灾避难的办法。而后算命先生先故作一番姿态，似言又止，向算命之人发出索要钱财的暗示。算命的人拿出钱财之后，算命先生装模作样地指点一番，破解了算命人的恐慌心理。

但城隍庙中并非所有的江湖先生都靠坑蒙拐骗为生，“江湖郎中”是真的有些治病救人的本领。城隍庙中的“江湖郎中”一般靠卖膏药和跌打损伤药为主，这些药的价格都比较便宜，且对感冒、腰疼腿肿等普通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因此受到了底层劳苦民众的欢迎。但这些郎中为了招徕顾客，便夸大自己所卖药的疗效。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会”，“妙手回春”“华佗再世”“包治百病”的幌子、锦旗就挂满了城隍庙中的“扯谎坝”。由于城隍庙是“三教九流”汇聚之所，精英一般是不屑于到此来看病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失身份的事情。如成都的歇后语就说到“扯谎坝儿的医生——专卖假药”^[17]。

当时的报刊和文献中有许多江湖先生诈骗新闻资料，表现出文化精英对江湖先生的偏见，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江湖先生本身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实际上，城隍庙中的算命、看相的先生似乎很受人欢迎，有的算命先生的摊位上围了不少人，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看热闹的。从当年报纸对城隍庙中江湖先生的记述来看，这些江湖先生的收入并不高，“每天平均也不过一元多”^[18]，这种收入在当时仅供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因此城隍庙附近的小吃摊就是这些算命先生经常光顾的场所。当然还有一些算命摊子前就显得异常冷清，忍饥挨饿是常有之事。

总的来说，从小摊贩、江湖先生的经济活动状况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成都个体经济的商品结构单一、发展水平比较低，他们主营的都是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初级产品，如小吃、纸钱、香蜡、普通药物等，这种经济特点，也突出体现在城隍庙经济中；

其次，以城隍庙个体经济为代表的民国成都的个体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且发展特点也不相同。北门城隍庙会每年都会举行大型庙会，即使在平时，庙前的六十多亩空地上也云集了各类商贩，是个体商业较繁华的地区。东大街的城隍庙经济主要是大型商品交易，个体经济较弱。而华阳县的城隍庙既无庙会，平时庙中商贩也比较零散，主要是一些兵士和算命先生。^[19]正如前文所述，即使在同一座城隍庙中，受商品质量、经营手段等因素的影响，个体商贩的经营状况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四、“旧瓶装新酒”——城隍庙经济的近代转型

成都自古以来寺庙宫观众多，如大慈寺、昭觉寺、武侯祠、青羊宫等都是城市中重要的宗教活动空间和经济娱乐场所。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记述了寺庙在城市经济和娱乐活动中所居的重要地位。^[20]清末和民国时期，很多的新式机构如学校、行会和工厂都是依靠寺庙的资产和建筑作为其活动的重要条件和场所。抗战时期，成都的慈善救济事业蓬勃发展，寺观宫庙发挥了积极作用。城隍庙在其中也担当了重要角色。如在东较场的城隍庙就设立了市立救济院老废所。这所救济所由市政府主办，采取财政拨款，因而经费充足。该所引进了一些先进的卫生医疗设施，采取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有专聘医师2人轮流在院诊治，中西医诊疗所亦时常送诊，并规定每周沐浴一次。”在此院内的患者“衣食住均由院中供给，每人冬夏季衣服各两套，冬季棉被1条，夏季草席1张，每日2餐蔬菜饭，一干一稀饭。稍能活动者作轻松工作”^[21]。

由于城隍是民间信仰，大众化属性明显，其顺势趋利的特点突出，在整个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认同和经济至上的特点。这一特点，促使城隍庙经济在近代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顺应时代的发展，接纳和建造新的经济体，实现社会经济改造的需要。

城隍庙一方面在适应社会的发展中进行着自我的革新，积极融入社会经济的改造中；另一方面，也积极发挥寺庙经济的作用，为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北门的城隍庙在1929年设立了工厂，为民生工厂第一劳工工作场。^[22]民国成都的城隍庙一度作为慈善救济机构和工厂，为这些机构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空间基础，城市经济的转型因而有了生存的土壤。同时，城市的新型经济和商业模式也逐渐改变了城隍庙的性质。城隍庙由原来的宗教型、经济型、文化型三位一体的综合型空间向专业化的经济空间裂变。城隍庙经济只部分保留了原有个体经营的形式，而其经济结构、经济成分、经济形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成都的一座城隍庙似乎被两个或多个新型组织机构所占用，这种新型组织的进入，使城隍庙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改变。而同时城隍庙中传统的经济和娱乐活动也在延续。如华阳县城隍庙的后殿在清末新政时期就被铁道学堂暂时用作宿舍，^[23]但由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之前官方并没有废除城隍祀典，所以华阳县城隍庙在抗战前，一直是善男信女烧香，士兵听算命先生摆“龙门阵”的好去处。^[24]一直到抗战后期华阳县城隍庙才设立城隍庙小学，至此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公共空间向现代文化空间的转变。城隍庙中这种新旧经济文化活动的并存其实正是民国成都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中西碰撞、新旧杂糅的真实写照。正如徐中约所说，“这些不同类型的活动并行不悖的状态，造就了一种混合经济，含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气息，这种气息是近一个世纪里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25]。

从古代到近代，城隍庙经济呈现了从寺庙经济，到以庙会经济为主的城隍庙经济，再到近代工商业经济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古代，城隍庙通过对香客的吸引聚集了大量的人口，产生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以个体经营为主，是小农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古代城市经济能在城隍庙中繁荣发展。及至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城隍庙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围绕城隍庙形成的近代工商业经济，则逐渐脱离城隍庙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它的发生发展，依赖于城隍庙的特殊性和城隍庙经济区域的特殊性，其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建立在近代城市工商业集约化和专业化基础之上，已经和古代城隍庙经济有了巨大不同。城隍庙的流动个体经济，逐渐被专业化的商店所代替，而其原有的宗教空间也顺应城市的发展转变为新式的经济场所（如北门城隍庙在改革开放后成为电器交易场所）。城隍庙，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和城市的一个符号。

注释：

① 笔者曾在成都市图书馆看见过一幅明天启成都《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摹《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府治图〉》）。图中显示了成都当时有两座城隍庙。一座在府城内正西偏南，另外一座在城外北郊偏西。但《天启成都府志》正文中只提到“城隍庙，府治西。”，而并未提及城北的城隍庙。详见：《天启成都府志·祠庙》卷3，引《成都旧志》，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② 关于晚清民国时期成都具体有几座城隍庙，学者存在不同意见。如据成都老艺人彭越先回忆，成都在民国时期有五座城隍庙，除上述三座之外，还有大墙后街（一说大墙东街）都城隍庙，成都西门的都司城隍庙；而袁庭栋则认为，成都有四座城隍庙（无西门都司城隍庙）。除正文中述及到的三座城隍庙之外，其余两座城隍庙规模小，庙中城隍不参与城隍出驾活动，且没有形成较具规模的市场，因而不在于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参见：彭越先《老成都的5座城隍庙》，成都城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故事百家谈》，2008年，第197—204页；袁庭栋《成都街巷志》，第17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四川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第156—158页。

③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庙市包括庙会、灯市和米市等大型集体经济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者往往是官方和地方精英。而下文谈到的小吃贩、算命先生和江湖郎中则以个体经济活动为特色，其活动往往是自发的，二者共同织就了城隍庙中的经济网络。

④ 妇女逛城隍庙会会有一个禁止到开放的过程。从现有资料来看，清末妇女被禁止参加城隍庙会，到了民国时期，庙会对妇女逐渐放开。但逛庙会的妇女依然受到社会大众的好奇和精英群体的批判，而且逛庙会的妇女经常有被流氓骚扰的危险。详见：《通俗日报》宣统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城隍会害人——少妇遇瘴神归家被夫责遂自缢而死》，《新新新闻》，1931年11月19日第10版。

⑤ 地方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江湖骗子的记载，地方报纸也时有报道。傅崇钜：《成都通览》上，第459—500页；郑蕴侠、家恕：《旧时江湖》，载《龙门阵》，1989年第3期；《通俗日报》，1909年3月27日、1909年3月31日。

参考文献：

- (1) 滨岛敦俊著，沈中琦译. 明清江南城隍庙考——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农民信仰[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01).
- (2) 彭越先. 老成都的5座城隍庙[A]. 成都城市群众艺术馆编. 成都故事百家谈[C]. 2008. 197—204.
- (3) 谢肇淛. 五杂俎（卷3）（影印本）[M]. 47.
- (4) 段全纬. 城隍庙记[A]. 董浩等辑. 钦定全唐文[C]；叶大箴. 华阳县志（卷30）[A]. 成都旧志[C]. 成都时代出版社, 2008. 775.
- (5) 天启. 成都府志（卷3）（影印本）[M]. 巴蜀书社, 1992. 27.
- (6) 李玉宣. 同治·重修成都县志·舆地志（卷2）[M]. 11；嘉庆·华阳县志·祠庙（卷17）[M]. 8；何云, 青成. 民国旧事——且说成都城隍庙[J]. 文史杂志, 2014, (4)；田凯. 清代地方城市景观的重建与变迁——以17—19世纪成都为研究中心[M]. 巴蜀书社, 2011. 202.
- (7) 王笛. 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M]. 中华书局, 2011. 52—59.

-
- (8) 谭继和主编. 竹枝成都——本土文化的经典记忆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156—158.
- (9) 下元会期外北城隍庙大办会——都市里的迷信风光 [N]. 新新新闻, 1936-11-14.
- (10)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 [M]. 三联书店, 1999. 135.
- (11) 杨燮. 锦城竹枝词 [A]. 成都竹枝词 [C].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161.
- (12) (16) 戴文鼎. 城隍庙杂记 [A].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锦江区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锦江文史资料 第八辑锦江文化 一 [C]. 2004. 131—139.
- (13) 樊树志.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 [J]. 学术月刊, 1990, (12).
- (14) 锦城旧事竹枝词 [A]. 袁庭栋. 成都街巷志 [C].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0.
- (15) 傅崇矩. 成都通览 [M]. 巴蜀书社, 1987. 462.
- (17) 黄尚军. 成都方言词汇 [M]. 巴蜀书社, 2006. 696—697.
- (18) 人间地狱巡礼府城隍庙花样多——猪脑壳集合地, 阎罗王香火旺, 是另一角落地社会 [N]. 新新新闻, 1937-10-20, 1937-10-21.
- (19) (24) 蒋蓝.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M].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 402.
- (20) 费著. 岁华纪丽谱 [A]. 墨海金壶·中四部丛编(第68册) [C]. 影印本. 1—5.
- (21) 成都社会概况调查&社会统计处印, 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上 二编 [M].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 517, 519.
- (22) 罗泽洲. 谕令北门城隍庙住持隆吉遵照勘定地点妥为布设一案文 [J]. 成都市市政公报, 1929, (4).
- (23) 《学部官报》(1907)第二十四期 京外学务报告 [A].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2辑 下 [C].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828.
- (25)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 [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8.